

一家三塔 载录民族交融

张政



【帖木儿塔】

帖木儿塔名列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位于阳曲县杨兴乡史家庄村东,由三座塔组成,为元代帖木儿家族墓塔,保存完好并有确切纪年,是研究元代历史人物及建筑史重要的实物资料。



帖木儿塔(AI生成)

担任邠州达鲁花赤、腾冲路达鲁花赤;史彦昌则长期为蒙古王公效力,“领东三州打捕鹰房都禁山官”,或许正因如此,在他们的墓塔上才单写自己的蒙古名。但有趣的是,他们下一代的姓名则呈现出了汉蒙兼具的特点。例如史彦昌,他的一个儿子取名为“脱因不花”,是一个典型的蒙古名,而另外几个孩子则取名为潭卿、祥卿、唐卿,与也先帖木儿塔铭出现的也先帖木儿之子之和卿、君卿名字中同有卿字,应该就是史氏家族的字辈排行。同一个家庭中,汉名与蒙古名并行不悖,由此可见,在当时,汉文化与蒙古文化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融合状态。这种文化上的融合,在帖木儿三塔建筑上得到了体现和保存。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境内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与交流中,早已和合为一家,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



红军东征太原 战略意义深远

左俊斌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加剧,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与此同时,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受困于根据地狭小、物资匮乏及国民党的封锁包围。为突破困境、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以实际行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唤醒民众抗日热情,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红一方面军为主力组建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于1936年2月发起渡河东征山西的行动。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从陕北清涧、绥德等地东渡黄河,突破阎锡山部号称“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进入山西境内,揭开东征战役序幕。为打破晋军防御体系、保障主力作战,3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交口县郭家掌村主持召开红军领导干部会议,作出分兵三路的作战部署:左路军由红15军团第78师、第75师及军团直属队组成,承担牵制晋军主力、威逼太原的战略任务;右路军向霍县、赵城、洪洞等晋南腹地推进,开展群众工作与物资筹措;中路军由红30军及山西游击队组成,作为机动力量保障通信联络与战术协同,形成“左牵右攻、中路策应”的格局。

负责太原方向攻势的左路军由徐海东、程子华、周士第带领,按部署先向灵石、介休等晋军重兵布防区域发起佯攻,迷惑晋军判断后迅速挥师北进,经孝义、汾阳、文水直逼太原。3月20日,部队进驻太原外围交城瓦窑头、清源高白镇(今属清徐县东于镇高白村)一带,形成对省城太原的战略威慑,直逼阎锡山集团核心统治区。3月24日,红15军团一部进驻古交、西铭、王封一带(距太原城仅20余里),骑兵前锋兵临小店、刘家堡、马练营一线,同时另一路奔袭太原河西临时军用机场,进一步压缩威慑范围;3月25日,左路军再派1个团及骑兵连突袭太原晋祠镇(今太原市晋源区),此处既是太原城垣西南部重要屏障,也是晋军粮草囤积要点。红军兵锋直指省城,引发太原城内的震动。阎锡山急调驻守晋南、晋西的晋军主力回防,原本计划阻击右路军的兵力被大量牵制;蒋介石亦命震部坚守榆次、太谷、祁县一线,构筑太原东南外围防线,妄图“围剿”红军。

面对此形势,左路军迅速调整策略。该部在太原周边展开灵活作战,以多点威慑之势,将晋军主力牢牢钉守在太原及周边城镇,既打乱了国民党军“追剿”计划,又为中路军、右路军在晋中、晋南的作战提供了有力支援。作战间隙,红军深入城镇乡村,向群众宣讲抗日主张,唤醒民众爱国热情,大批青年踊跃参军,充实革命力量。左路军先头部队在清源高白镇一带展开警戒部署,直面晋祠、太原方向布防,掩护78师主力向交城县城发起进攻。彼时,晋军独立第三旅傅存怀部与商震所部吕济142师已抢先占据交城,依托城防工事加固防御,兵力与火力大幅增强,红军经激战未能突破城防,攻坚行动受阻。徐海东、程子华等将领审时度势,迅速调整部署,命令78师撤至东社一带集结,75师挺进驻守峪口等地,形成犄角之势。部队一面休整补充、养精蓄锐,密切监视敌军动向伺机歼敌;一面组建地方工作团,开展扩筹款工作,夯实群众与物资基础。同期,红军相继进占南堡、东社、古交、麻会、岔口、燕庄等太原周边城镇,基本控制今西山、古交的乡村区域。指挥作战的徐海东虽刚伤愈体虚,仍亲率骑兵连频繁向晋祠方向游击袭扰,摆出大举进攻太原的强势姿态,持续牵制敌军注意力,支援左路军主力在文水、交城一带开展的工作。

左路军的一系列行动,引发国民党军高度警觉,阎锡山误判红军意在直取太原,随即全面加强防御,依托晋军王靖国部和杜春沂部等精锐,加固太原城垣、汾河防线及外围工事;急调原本在隰县、石楼尾追红军中路军的兵力驰援太原,摆出“太原决战”架势,同时在汾阳、孝义增兵布防,构筑外围防线。榆次、清源、徐沟等太原近郊各城镇,奉命紧急团防、赶筑工事。太原城内,绥靖公署(山西督军府旧址)大堂前与大门外堆积沙袋筑成掩体,架设轻重机枪,柳巷、海子边、饮马河、兵工厂、炼钢厂等城内外重要区域也增加了防御工事,全城实行昼夜戒严。阎锡山当局还推行“城市居民身份识别证”制度,借戒严之机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特别是成成中学、国民师范等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冲击,全城陷入白色恐怖,这也恰恰印证了红军战略牵制的显著成效。

为震慑红军,阎锡山公然标出资格:“凡击毙徐海东者,赏洋五万元。”徐海东从俘虏口中得知此事后,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爽朗笑道:“看来阎老西比蒋介石小气多了,蒋介石可是说过,谁砍下我的这颗头,赏十万大洋呢!”一席话引得战士们大笑,军心愈发振奋。

左路军为扩大回旋空间,在更广大地域宣传发动群众,主力从交城县岔口集结,转战于古交、娄烦、静乐、崞岚、岚县一带。国民党军虽紧随其后,却慑于红军战斗力不敢贸然逼近。3月26日,红15军团主力进至娄烦,75师223团兼程疾进奔袭静乐,随后转战吕梁山区,逐步撤离太原周边,后于兴县与红28军会合,圆满完成牵制晋军主力、支援全局作战的战略任务。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左路军以太原为核心的牵制作战,精准达成战略目的,有效打乱了晋军整体防御部署,为右路军南下纵深推进提供有力支援,更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旗帜深入人心,在太原红色历史上镌刻下深刻印记。

史家庄,这个从名字上一望可知的汉民族聚居村落里,为何会矗立着三座名字带有浓厚蒙古族色彩的古塔?仔细了解这些塔背后的历史,我们发现,这三座塔不仅有着厚重的艺术价值,更记录着中国古代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历程。

三座古塔里,东塔为三层密檐式砖塔,高约7米,是元武德将军、云南腾冲路达鲁花赤、也先帖木儿墓塔,元至正十年(1350)由也先帖木儿诸子为父所建。也先帖木儿是蒙古名;达鲁花赤亦是元朝地方官职,总揽一省行政大权,兼领监督军事之责,可谓位高权重,并且元朝建立之初,明令只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才能担任此一职位。这么看来,这位也先帖木儿该是蒙古人了,但是,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答案就藏在中塔里。中塔为经幢式八角石塔,高3米,塔身下方刻着“史公仲显之墓铭”。史仲显是何许人也?在塔身上刻着这么一段话:“维大元国武德九年五月二十日命工打道到石塔一座,立石塔人孝男/也先帖木儿书/史彦昌/”。原来,史仲显是也先帖木儿的父亲。这说明,也先帖木儿并非蒙古族人,而是汉人。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疆域空前辽阔的一个朝代,同时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时代。广阔的领土,强大的统

治、便利的交通,促进了国内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民族的文化 and 生活方式彼此交流,最终趋于统一,实现融合。当时有大量蒙古人取汉名,其最著名者当属元末名将扩廓帖木儿,汉名王保保;也有汉人取蒙古名,也先帖木儿便属此例。

中塔和东塔的主人已经确定,那么西塔的主人自然也就呼之欲出。西塔为拜延帖木儿墓塔,形制与东塔类似,高约7米。帖木儿三塔的建立时间次序为:元大德九年(1305)建史仲显墓塔,元至正十年(1350)建也先帖木儿墓塔,元至正十三年(1353)建拜延帖木儿墓塔。结合三塔位置,父辈史仲显塔居北居中,其左侧(东侧)为也先帖木儿塔,右侧(西侧)为拜延帖木儿塔,左、右二塔形制类似,建造时间接近,位置符合儒家传统的昭穆次序,按照兄居左、弟居右的习惯,那么拜延帖木儿塔的主人,应该就是也先帖木儿的弟弟,上文中提到的史彦昌。拜延帖木儿塔修建时间(1353)距史仲显墓塔修建时间(1305)有48年之久,推测可能在史仲显塔建立之后,史彦昌拥有了蒙古名拜延帖木儿。按此推测,也先帖木儿也应该有汉名,只是未能流传下来。

史氏家族的这两位成员,不仅拥有蒙古名,还与蒙古女性通婚,并都在元朝担任高官。也先帖木儿曾打破只有蒙古人才能担任达鲁花赤一职的限制,以汉人的身份

晋阳蓄势 后汉崛起

韩靖宇 逆北

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五代十国这段中国古代最纷乱的历史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从唐朝灭亡的907年,到宋朝建立的960年,短短53年间,北方地区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次王朝更迭,南方与河东、巴蜀等地也分立着十余个割据政权。《太平年》的主角虽然是励精图治的后周君臣,但后周奉行的政治文化与军事体制都继承自后唐。因此,如果说“太平年的理想”在柴(郭)荣北伐与赵匡胤黄袍加身后逐渐成形,刘知远从太原崛起至定鼎中原则可称为“太平年”的序曲。那么,历史上的刘知远是如何经营太原、争取民心、巩固权力、建立后汉政权的?

刘知远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与太原高度绑定。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刘知远生于太原县(今山西太原市)一个沙陀武将家庭,其父刘瓛是晋王李克用手下的列校。刘知远自幼勤习弓马,长大后成为后唐明宗李嗣源帐下的偏将。此时正值梁晋争霸,在一次交战中,同为唐明宗偏将的石敬瑭的马甲断裂,刘知远挺身而出,将自己的坐骑换给石敬瑭,并掩护他顺利撤退。唐明宗继位后,石敬瑭高升为北京(即太原)留守,感念刘知远的援救之恩,将他调任到自己手下担任牙门都校。

石敬瑭举兵反叛后唐,刘知远与桑维翰为之谋划,并率军死守太原城,为石敬瑭称帝立下头功。后晋天福六年(941),石敬瑭任命刘知远为北京留守,兼河东节度使,镇守太原。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太原地处太行山以西、汾河谷地中,自古为河东核心重镇,北邻长城边塞,可直接控御草原游牧民族南下通道,控扼并陘、壶口等关隘,俯瞰河南、关中两大中原腹地,城池依托龙山、汾水修建,地势易守难攻,兼具军事防御、物资囤积、兵员集散的天然优势。自魏晋隋唐以来,太原就多次成为割据政权与开国帝王的勃兴之地;北齐高欢以晋阳为别都,掌控东魏实权;李渊、李世民自太原起兵,最终一统天下建立大唐;沙陀军事集团更是以河东为根基,李存勖建后唐、石敬瑭建后晋,均是以太原为起点入主中原,最终成就霸业。刘知远作为沙陀军事集团核心成员,亲历后唐、后晋建国全过程,自然深谙太原战略价值,但是,从武将成为乱世枭雄,他尚需一个历史契机。很快,机会出现了。

刘知远到任后不久,石敬瑭去世,后晋皇权更替,新君石重贵一改石敬瑭对契丹卑躬屈膝的姿

态,拒绝向辽太宗耶律德光称臣纳贡,从而导致契丹人的大举南侵,中原再度陷入巨大的动荡期。在乱局之中,刘知远清醒地认识到,唯有以太原为统治中心,保存实力、静观其变,待后晋与契丹两败俱伤之时,才能以最小代价收拾残局成为最后赢家。因此,面对后晋朝廷的征调,刘知远都敷衍了事,转而大力扩充太原兵马。

乱世之中,兵权即是政权的基础,无强兵则无立足之地,军事建设是刘知远经营太原的核心。一方面,他发掘并重用了郭威、史弘肇、杨邠、王章等能臣,构建起自己的核心军事班底。日后建立后周的郭威统率全军战略与作战部署,兼管新兵训练;史弘肇负责太原城防修缮、关隘驻守与军纪执行;杨邠掌管军队调动、兵籍管理与斥候侦察;王章协管军粮与军械补给。四人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高效的军事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刘知远也重视兵员的扩充与整编。这一时期,天灾、战乱造成了大量的流民和溃兵,刘知远对其大力招揽,筛选其中的精壮者编入军队。同时,他还在郭威的建议下,吞并了吐谷浑部落,“得良马数千匹、财货百万计以资军”(《旧五代史》)。据《资治通鉴》所载,到后晋灭亡前夕,“河东富强强寇诸镇,步骑至五万人”。刘知远已经拥有了逐鹿中原的资本。此外,刘知远手下将领郭威也初步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军事班底,如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就投于郭威麾下,凭借军功占得一席,这也为赵匡胤日后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开运三年(946)底,后晋大将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率部投降,契丹军队攻入开封,后晋正式灭亡。次年二月,耶律德光在开封皇官登基称帝,改国号为辽,并下诏要求各藩镇节度使立刻上表称臣。多数藩镇畏惧契丹的兵锋,纷纷遣使奉表上降表。此时,太原的文武百官、豪强士绅联名劝进,请求刘知远顺天应人,称帝建国。刘知远假意推辞一番后,便在太原城南筑坛祭天,正式登基称帝,国号为汉,史称后汉,并仍沿用后晋天福年号,以当年为天福十二年(947),表示自己不忘晋室,借以安抚中原士民与后晋旧臣。

就在刘知远称帝的同时,契丹人在中原境内“打草谷”的残暴行为引发了激烈反抗,各地义军蜂起,耶律德光统治濒于崩溃,被迫撤军北返,途中病死于滦城,中原出现了新的权力真空。刘知远顺势打出“驱逐契丹、恢复中原”的旗号,自太原南下,命潘璋以史弘肇等率精锐为先锋,直取开封。一路上,后晋旧将纷纷归附,契丹留守军兵望风而逃,洛阳、开封等重要重镇不战而下,刘知远仅用了两个月时间便顺利平定中原全境。当年六月,后汉正式迁都开封,改元乾祐,刘知远也完成了从一方藩镇到中原之主的彻底蜕变,走上了人生巅峰。明末清初史学家王夫之对此也加以肯定,在《读通鉴论》中评价道:“刘知远之自立也,在契丹横行之日,中土无君而为之主,以拒悍夷,于华夏不为无功。”

从晋阳经营筑基,到汴梁定鼎开国,刘知远的传奇人生,不但是整个五代历史的微观缩影,更在中国古代割据与统一交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由藩镇将帅走向帝王的经典样本。刘知远的成功证明,在天下大乱的时代,稳固的根据地和精准的战略时机抉择,远非一时的兵力强盛、武力扩张更为重要。《太平年》的艺术演绎,突破了正史的海阔与距离感,让这段长期被封存、被忽略的历史,重新走进大众视野。在剧集与史实的交织对照中,我们既能读懂五代乱世枭雄的生存与崛起,读懂太原这座古城贯穿千年的军事与文化底蕴,更能读懂中原文明在连绵战火中,始终坚守秩序、追求安定、不断自我重生的坚韧力量,而这也正是这段历史跨越千年仍具备研究与解读价值的核心原因。



电视剧《太平年》剧照(素材四片)

太原市晋源区全域及小店、万柏林两区部分地界。和三晋大地诸多地方一样,太原县的春节自腊月初八启幕,至正月方浓,每项习俗都刻着传统印记,裹着山西人的温热,时至今日仍能寻到鲜活的传承。

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至,年味愈发浓烈,县志中所记的“设糖饼、果菜、香烛祭灶”是各家重头戏。当地百姓偏爱薄饼状灶糖,以这份甜糯“黏住”灶王爷的嘴,盼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孩童们围灶踮脚,就为等一块甜透心底的灶糖。刘大鹏也写道:“(当送神之时)祝曰:‘诸神上天只祈说人间的好,不可说人间的恶’。”

从腊月二十四“胡打扫日”到除夕,是当地老百姓最忙碌也最热闹的时段。近代地方史学者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曾记:“岁暮之时,千村万井,皆忙于年节之事。”扫屋添彩、缝制新衣、赶集采买等都被提上日程。按老规矩,二十八要“贴扎”,门神、春联、窗花、长钱(门帘子)一一备齐,换下旧年尘俗晦气,让门内充满喜庆红。

除夕这天,可谓“仪式感拉满”,县志载:“除日,易门桃符,春帖,挂长钱;除夕,陈礼物于祖,称‘辞岁’。”傍晚,家家户户闭门团圆,庭院里点燃煤块垒成的旺火,火苗越旺,越寓意来年兴旺红火。年夜饭必吃糕或面,糕取“步步高升”之意,面求“长命百岁”之福,饭后全家围坐包初一的饺子,冻在庭院中,践行“年年有余”的期许。通宵守岁时,长辈会将压岁钱压在孩童枕下,护佑其平安顺遂。

正月初一,县志载:“孟春朔日,五鼓旦起,各家设燎燎、香案、奠仪,大小罗拜天地、祖先。”迎神祭祖是春节的核心习俗。仪式在五更鸡鸣之时举行,“鸡鸣而起,爆竹焚香,张灯结彩,迎神逐祖”。彼时,城内外晋祠、文昌阁、观音庙、兴化洞、兰若寺等各庙宇亦于五更敲钟,唤醒众人起身行礼:“五更各庙鸣钟,惊醒世人早起迎神。”20世纪20年代,学者吴庚鑫在《山西省太原县社会风俗调查》中记:“年节仍依旧习惯。旧历元旦五更燃灯焚香敬神……各家房上竖柏枝,门前燃柴火,俗名‘旺火’,意在驱除不祥。”如今,太原各地及周边地区老百姓“点旺火”习俗仍存。刘大鹏在1922年的日记中亦写道:“五更起来迎神祭祖,祭于堂上,仍遵旧礼。”抗日战争时期,诸多年份因战乱式微,唯有迎神祭祖被坚守,刘大鹏1939年所记便是佐证:“今日元旦佳节,通宵寂静,概无一切杂声将人惊动,五更起来,迎神敬祖。”

正月年俗中,拜年是重头戏,当地有“正月说话忌冲撞,吉言顺耳纳福康”的谚语,足见对吉利言辞的重视。长辈常叮嘱晚辈多讲“添福添寿”“五谷丰登”之类吉语,忌说晦气话。正月初一至十五前,“邻里戚族,俗以今日往来相贺,谓之拜年。”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传统礼节增添了中西交融的时代印记。吴庚鑫记录道:“天明彼此往来拜贺,有脱帽鞠躬者,有屈膝叩首者,商人见面互揖,称见面发财。”尽显新旧风俗交织的韵味。晋祠附近百姓的年俗,多与晋祠这一名胜紧密相连。正月初一,赴晋祠祈福、拜神、观戏者络绎不绝,刘大鹏在日记中记下“上庙拈香时,骑马行路者尚不避途”的热闹,亦载“朝到晋祠参神贺年”“诣晋祠宇下,参拜各神,而在祠内之人纷纷扰扰”,足见乡人赴祠参神的壮观。正月初八“开市日”是当地特有活动,此前商铺歇业,当日“里中商号,今日开市,晋祠商家亦然,向晓张灯结彩,爆竹迎神,放炮迎吉”,自五更至午时,晋祠上下人潮涌动,春节贸易自此开启。20世纪20年代也常见正月初五“开市”传统,吴庚鑫记道:“初五日后,人民各执其业,商号择吉(时)开市。”

传统年俗可延续至农历正月十五乃至二月二“龙抬头”。这些流传百年的习俗,藏着太原百姓对生活的期许,也成为三晋大地上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

太原县春节习俗

张悦

